

21.02
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重庆开埠史稿

重庆地方史资料组

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重 庆 开 埠 史 稿

隗瀛涛 周 勇 著

重 庆 地 方 史 资 料 组

· 一九八二年六月

前 言

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地居四川盆地东南，它借长江及其支流之便，沟通了四川盆地内部，并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系。自古以来，重庆就是四川东部地区的商业重镇。但是，到了近代，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从十九世纪末年开始，重庆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乃至西南各省区的基地。

在一八九〇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签订以前，整个四川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性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开始受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冲击，但就社会经济而论，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一八七六年的《中英烟台条约》使英国取得了侵略西南的法律根据。一八九一年重庆开埠则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大限度地从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推进到了中国的西南腹地地带。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本逞其淫威，给中国加上了《马关条约》这条空前屈辱的锁链，气势汹汹地与英国在重庆角逐。美、法等国侵略势力也争先恐后伸入。重庆开埠以后，以英国为带头羊，日、美、法各国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租界，强索租借地，和清朝四川政府勾结一气，与人民为敌，又辅之以军舰入侵的军事威胁和宗教传播为主的文化侵略，以重庆为枢纽由点及面辐射渗透，把四川推入了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与穷凶极恶的政治军事侵略并举的是猖獗的经济侵略。重庆开埠以后，洋货入川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经重庆浸及穷乡僻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四川的自然经济基础。经济侵略的另一手，则是掠夺四川矿产资源，川江航权，开设工厂、公司及洋行。帝国主义以重庆为基地，把四川市场以及与四川相联系的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的部份市场也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渐加深。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迈步向前。

重庆人民有光荣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传统。自一八六三年第一次重庆教案以来，农民和城市人民的斗争连续不断。重庆开埠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清王朝的腐朽和卖国，尤其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针对中外反动统治者的合流，重庆人民最早提出了“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以新的姿态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宣战，推动了整个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酝酿了辛亥革命高潮。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正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里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使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扩大化和尖锐化。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对重庆的侵略，造就了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产阶级，以“森昌字号”开办为标志，四川的民族资本主义首先在重庆产生。经过二十年的发展，重庆在火柴、纺织、玻璃、航运、电灯、制造、矿业等行业中建立了一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成为四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为资产阶级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

要的物质前提。

重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除具有全国的一些共同特点外，还有自己的特点：

（一）重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重庆开埠的同时，比沿海省区约晚二十年，它主要是在“振兴商务”、“挽回利权”的口号下，直接针对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而产生的。重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开始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已形成影响全国的政治思潮。因此，当洋货呼啸而来之时，重庆的工商业者就可以立即拿起民族主义这个武器去回击帝国主义。

（二）重庆民族资产阶级是四川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当时这个队伍以中小资本家为主体，与帝国主义比较疏远。这个阶级尽管力量弱小，但从戊戌变法时期开始，他们的斗争便有一定声势。

（三）重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封建主义有较多的联系，但与帝国主义联系较少，较有反帝勇气，他们领导的收回江北厅矿权的斗争显示了这一特点。在辛亥革命中，由于革命派占了优势，他们在相当程度上站在革命一边，接受革命派的领导，从经济上和军事上赞助革命。

（四）重庆保路运动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不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革命派以同盟会重庆支部为核心，经过长期的准备，掌握了武装力量，并且不失时机地发动了起义，趁全国革命高涨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革命力量迫使重庆的清朝官吏缴械、投降，建立了“蜀军政府”。“蜀军政府”是四川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它不仅推动了川东各州县的起

义，而且促进了成都独立，壮大了全国的革命声势。尽管这个政权存在的时间不到半年，但是它在结束清朝在四川的专制统治、传播民主主义思想方面所建立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辛亥革命在重庆的失败留下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教训，从而启迪了进步人士为拯救中华而进行新的探索。新陈代谢的历史辩证法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革命的面貌将为之一新。

重庆开埠的历史不仅是四川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课题。我们的祖国疆域辽阔。由于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历史也就显示出了地区的差别性。只有深刻地认识这种差别性，一部中国近代史才能丰富多采地、准确地阐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

我们写作《重庆开埠史稿》的目的在于：通过对重庆开埠的历史回顾，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这方面的参考材料。

本书分五章：以重庆开埠及其影响为基本线索，着重叙述从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重庆政治史和经济史。由于有关资料史料相当分散，不易收集，特别是我们的理论和业务水平的限制，本书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地方史资料组、重庆市图书馆、重庆市博物馆等单位的大力帮助，谨致感谢。

隗瀛涛 周 勇

一九八二年四月于四川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重庆开埠始末	(1)
一、侵略者的野心	(1)
二、一场开埠的前哨战	(3)
三、马加理案中关于重庆开埠的交涉	(6)
四、英国强迫重庆开埠	(11)
五、日本强迫重庆开埠	(22)
第二章 帝国主义由点及面，对四川侵略的 全面展开	(29)
一、领事馆的设立——帝国主义政治势力的侵入	(30)
二、租界和租借地的设立——第一次在四川建立 起“国中之国”	(33)
三、重庆海关	(37)
四、川江航权的丧失	(43)
五、经济侵略势力向全川渗透	(49)
六、疯狂掠夺四川矿产	(58)
七、宗教文化侵略的新阶段	(63)
八、自然经济的破坏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70)
第三章 重庆民族资本经济的发生和发展	(82)
一、火柴业	(82)
二、棉纺织业	(87)
三、缫丝业	(94)

四、电灯业·····	(97)
五、川江航运业·····	(99)
六、矿业·····	(102)
七、玻璃业·····	(104)
八、制造业·····	(109)
九、其他·····	(111)
十、买办资本的发生·····	(112)
第四章 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重庆人民反帝	
反封建斗争的高涨·····	(115)
一、重庆人民自发斗争的新阶段·····	(115)
二、十九世纪末的维新思想和维新活动·····	(118)
三、重庆总商会·····	(129)
四、收回江北厅矿权的斗争·····	(137)
第五章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重庆兴起，资产	
阶级共和国理想的尝试·····	(144)
一、二十世纪初年重庆的形势·····	(144)
二、邹容和他的《革命军》·····	(149)
三、同盟会重庆支部的建立，革命力量的积聚·····	(160)
四、保路运动在重庆开展·····	(171)
五、蜀军政府的成立，辛亥革命的失败·····	(178)
附录：重庆开埠史大事记·····	(203)

第一章 重庆开埠始末

一 侵略者的野心

扩大对外贸易是近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既定国策，正如汉密尔顿爵士所说：“要是没有商业，就不会有陆军和海军。我们国家每一个人的义务就是发展商业。……商业是‘我们的生命源泉，是我们的生存气息，没有它，英国就会成为北海中最贫困、苦恼、人口过多的一个小岛’。”^①可见，政治和军事的侵略乃是英国向外扩张的手段，而经济掠夺才是他们的目的。

一八四〇年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发动了罪恶的鸦片战争。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口通商以后，英国对华输出商品总值曾经有昙花一现的增加。然而，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和鸦片的大量输入，英货进口总值很快便徘徊不前，并没有取得战前英国资产阶级所期望的效果。因此，英、法两国伙同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来进一步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又取得了天津、营口、南京、汉口等十一个通商口岸，其势力开始伸入长江流域。中国的海关也落入了英国侵略分子之手，确立了值百抽五的关税税则和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税则等一系列特权，在扩大对华贸易上前进了一大

^① 汉密尔顿爵士在中国协会一八九一年年会宴会上的发言，[英]伯尔·考维茨(N. A. Polcvits)著，江载华、陈衍译：《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第一九二页。

步，对华输出商品总值直线上升。一八六四年为一〇，四九六，一七八海关两，一八七二年达到了二六，二五三，三四三海关两，八年间增加了一.五倍，在中国进口总值中的比例也由19.9%上升为37.4%①。

然而，好景不长。一八七三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欧洲……极端不景气，英国的工商业也很萧条”，因此，作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远东便具有特别的意义了”。可是与英国资产阶级转嫁危机的愿望相反，对“中国贸易却表现出最初是下降”（一八七三年就降为二〇，九九一，〇一二海关两），“后来是停滞”并“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只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有点回升，但随即又降落下去了）。在他们看来，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英国产品加速流入各通商口岸，同时内地分销仍和以前一样困难，以及内地市场没有开辟”。因此，进一步扩大其商务，就成了英国的战略目标。只有开辟更加广大的中国西部市场，才能实现这一目标。②

对于中国西部市场，尤其是对四川、云南，列强早已跃跃欲试，积极准备在长江上游地区实现通航和通商。一八六一年，一批外国冒险家乘帆船入川。原计划顺江而上前往西藏，后只行至夔府而止。此次航行共达五个月之久，一路千方百计搜集水流险滩和帆船航行的资料，然后就公开提出入川轮船应该具备的结构特点，鼓动外国侵略者利用先进的水上交通工具，深入四川。③一八六九年，“上海洋商总会特派商董一人来渝调查商务有关开

①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一五九四页。

② 以上引文见《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一二六——一二七页，所引数字见《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一五九四页。

③ 聂宝璋：《川江航权是怎样丧失的？》，《历史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五期，第一三一页。

埠之动议。”^①这一时期，“英国的毛织品正在失掉美洲和欧洲的市场。”哈德兹斐德市商会建议书指出，“必需取得中国西部有潜力的市场来补救”，“布莱德福德市商会已经准备好了关于四川和云南的详细报告，……得到哈利法克斯市商会的另一代表威廉·莫利斯的附议，他把中国西部几千万的主顾说成是最大的未开辟的市场。”^②一八六九年底，上海的英商商会在发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里强调说：“除非汉口以上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对华贸易就不能扩张。”^③“一八七二年一月，（英国）商会联合会又写建议书要求扬子江上游对外国轮船开放，以便‘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几乎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④

一八七二年，法国冒险家堵布盖（J. Dupnis）率领一个考察团由越南赴四川、云南考察。^⑤迨到一八七三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一问题更加紧迫，因此，重庆开埠问题便正式提到日程上来了。

二 一场开埠的前哨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通过“借师助剿”太平天国革命，对西方列强的态度逐渐由疑忌转为依赖，开始走上了买办化的道路。他们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主子和奴才之间仍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重庆开埠，正是他们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的结果。

① 邓少琴：《川江航运史稿·年表》，未刊稿。

②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一四五——一四七页。

③ 《历史研究》一九六二年第五期，第一三一页。

④ 商会联合会第十二年度年报，一八七二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一三三页。

⑤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一七六页。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Robertson D. B）在一封信中说：“我们真正的政策不是将西方文明强加于中国，而是听其自然。”因此，“（英国）外交部相信在不离开这个前提，以逐渐接近和不惹人注意的外交方式，可以解决一些最令人烦恼的通商问题，如厘金和扬子江上游的航行等。”^①这是西方列强的惯用伎俩。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由于中国人方面没有明敏的政治家，曾被英国代表们抓住作为他们提出其它要求的机会，以便使其他较大的各种问题可以获得解决。”^②现在英国公使威妥玛（Wade T. F）为了实现英国扩大商务的战略目标，“追随了这些前例”。^③

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有洋货进入四川内地市场，其运输方式一般为四川商人经长江到上海、汉口，或经陆路到湖南、广东等地，与当地经销洋货的商人进行交易而运入四川，同时也有一批外地商人携带洋货入川销售。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一八七五年，经重庆进口的洋货总值，也仅仅一五·六万两。^④如此广大的四川市场，只销售这样一点洋货，当然不会令列强满意，因此，在他们正式提出重庆开埠以前，就自带洋货叩响了四川的大门。

一八七四年，英、法、美公使先后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声称英商信和、法商泰昌、美商公泰洋行共计货船六十九只，携带洋货入川，经过川省夔关被扣，船货均有损失，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据史料记载：“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二、初七等日，据英国使臣威妥玛照会内开，英商信和行在江汉关领照运货往内地，被

①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一二七——一二八页。

② 马士（H. B. Morse）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三二三页。

③ 同上书，第三二四页。

④ 《耐维耶报告》第一六〇页，转引自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第一三三页。

川省官员扣留，……六、七等月及十一月间，复据英国使臣照会，大致以洋商请领税单，如将土货搀入于江汉关必不允从，并以被留货船共三十三只，内风沉一只，亏本实多请即照数赔偿。六月二十三日据英（应为法——作者注）国使臣热福理（de Geofroy F. L. H）照称，本国泰昌行禀，有十五只货船经过川省夔关，扣留七十余日，致将货物损坏。十二月十七日复据法国使臣罗淑亚（de Rochechouart, Comte）照开赔单数目，恳请完结，……七月九日、十日等，据美国使臣艾什敏（Avery, B. P.）照称，本国公泰行报称，洋货运入夔关，被扣货船二十一只，请赔价值”。一八七五年二、三月间，威妥玛以“完纳一半厘金”，并拟出京到福建、湖北、四川等地“索偿坐扣洋税作抵”相要挟。而罗淑亚则叫嚣“若不在京中或汉口会商，只得令本国水师提督办理”，公然对中国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经四川督臣吴棠调查，所谓美国公泰行，乃“渝商魁盛隆各字号”“假冒”，另案处理。而“英商信和、法商泰昌货船……货物全无损坏”，赔偿要求遭到拒绝。美国使臣理屈词穷，不再吭声。而“英法两国使臣据约索赔，哓哓不已”。总理衙门慑于英、法压力，同时考虑到英、法与美终有区别，故“彼族得以藉口，威妥玛有在各处坐收洋税作抵之语，此次前往上海等处，难保不令洋商少完税银，以为赔偿之计，……罗淑亚照称令水师提督前往云云，未始非虚声恫喝，然止之则益张其焰，听之或竟实其言，……亦欲借此挟制，以逞狡谋。设竟肆意妄为，难免枝节横生。且肇衅于此，则貽患于彼，亦失情理之平。”因而奏请皇帝予以解决。

一八七五年三月，上谕“着魁玉（成都将军——作者注）、吴棠飭令夔关……速将此案办结，总期消息未萌，毋任迁延生

事。”并“著李瀚章（湖广总督——作者注）、翁同龢（湖北巡抚——作者注）、刘坤一（两江总督——作者注）预为防范，如该国有藉端诈索之处，必须据理按约，持平与辩，勿堕其术中，致貽后患。”^①此事最后结果如何，经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东华续录》同治光绪朝、光绪十九年《奉节县志》和《巫山县志》均无下落。

这一事件，既是列强自带洋货侵入四川的尝试，也是对于清朝政府对他们侵略行径所抱态度的试探。

三 马加理(Margary. A. R)案中关于 重庆开埠的交涉

当英国势力已侵入缅甸的时候，为了打开从上缅甸到我国云南的通道，一八七四年，英国派出了一支武装部队闯入中国云南境内，驻北京的英国使馆派翻译官马加理前往参加。一八七五年初，这支部队遭到了腾越地区的中国人的武装阻击，侵入者被迫退回八莫，马加理被打死，英国立即以此作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挟索与讹诈。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不惹人注意的外交方式”，忠实地履行了英国资产阶级赋予他的夺取更多的通商口岸和侵略特权的职责。

三月十九日，威妥玛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解决滇案的六条要求，其中就已包括了与滇案无关的通商方面的要求，遭到中国方面的断然拒绝。随后，威妥玛交替使用军事、外交、政治手段威胁中国政府，并得到美、俄、法、德等国不同程度的支持。而此时的中国，正值西北和东南边境受到威胁，清政府在处理伊犁和

^① 以上引文均见《总署奏英法美三国迭次照会夔关扣留货船索取赔偿谨陈大概折》，光绪元年二月初四日，《清季外交史料》第一卷，第五——八页。

台湾事件上的教训，记忆犹新。为了预防西南边患发生，故持慎重态度。双方进行了激烈地讨价还价。^①

一八七六年六月二日，威妥玛将英国的侵略要求列为八条，其中第五条要求“英国派员在云南大理府或他处驻居，四川重庆府亦然”；同时还要求中国在沿海、沿江、沿湖地区开放若干通商口岸。清政府原则上同意了滇案各条，但在通商要求上，只同意开宜昌一口；对于英国派员驻居大理、重庆一节，“言明非通商地方，不能驻领事”，^②拒绝了英国的无理要求。后因窃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侵略份子赫德（Robert Hart）出面“调停”，清政府又允开了温州、北海二口。然而，在赔款数目上，没能满足英国“无论索偿数千，或少至数万、或多至数百万、数千万元，中国必当应允，无可商量”^③的蛮横要求，因而威妥玛推翻前议，使谈判破裂。

然而，此时正值英国在土耳其问题上发生国际危机，军事力量无法东顾，“非常希望云南问题从速解决”。^④况且，美、俄、德、法等国也不同意威妥玛提出的与滇案无关的侵略要求，有的甚至企图出面干预，使英国处于比较孤立的地位。可是，威妥玛和赫德狼狈为奸，趁机向清政府炫耀武力，实行军事恫吓。七月十七日，赫德致书李鸿章说：“听威大臣口气，英国实在看此事为要紧，恐不肯从权轻易了结。”“西国情形现为土耳其事日有变动，英国朝廷愿趁此机会叫别国看明白，该国力量既能在西洋作主，又可在东方用兵，随意办事。”^⑤并且指名要李鸿章去烟台与威妥

①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二四一——二五三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六卷，第八——九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第六卷，第十一页。

④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二五〇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第六卷，第二〇——二一页。

玛会谈，而且须“奉有全权便宜行事之谕旨”，还告诫他说：

“必有新样主意，商办事件要大方。”^① 清政府只好同意，于七月二十八日命李鸿章去烟台与威妥玛谈判。实际是屈从于英国压力向英国侵略者投降。

八月二十一日烟台谈判开始。威妥玛偕海军上将雷德尔（Admiral Ryder）和兰波特（Admiral Lambent）前往，表示要以武力为后盾放肆要挟。九月五日，他向李鸿章提出了三大端解决办法，其中“请开口岸分作三项，以重庆、宜昌、温州、芜湖、北海五处为各领事官驻扎”。^② 首次要求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广运川滇之货”。李鸿章则坚持“总理衙门已于八条内议准，未便即作通商口岸”，并声明“川江峡滩险阻，轮船万不能行，故声明候轮船能上驶时，再行议办。”^③ 威妥玛也只好答复李鸿章说：“前款所添开口岸分作三项，其一则四川重庆、湖北宜昌、浙江温州、安徽芜湖、广东北海五处，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重庆一口本可派领事官驻扎，惟轮船未抵重庆之先，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开行居住。”^④

九月十三日，在英国军舰的威胁下，李鸿章和威妥玛签署了《烟台条约》。它由“了结滇案”、“优待往来”、“通商事务”三部份和“另议专条”组成。在第三部份“通商事务”的增开口岸一节中明文规定：

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馆驻扎处所。

① 《清季外交史料》第六卷，第二十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第七卷，第五页；《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二十卷，第一页。

③ 《东华续录》光绪十，第十六页；《清季外交史料》第七卷，第六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第七卷，第十七页。

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①

由于威妥玛没有达到使中国将重庆开埠的目的，英国商界“认为这又是另一次出卖。这完全不是商界所希望的”。^②但是英国政府则比一心只图赚钱的商人们更为狡诈，它明白，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完全实现其侵华野心是不可能的。于是装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由英国外交部辩解：“女王政府因为非常不愿对中国政府逼迫太甚或危及它的稳定，所以在许多事例中没有坚持完全满足要求，虽然具有强迫他们到极端程度手段，但由于容忍，没有使用这些手段，希望中国政府会逐渐醒悟，明白它对于列强所负的义务。”^③显然他们是要使清政府成为他们的忠顺工具，并通过它来实现对全中国的半殖民统治。

《烟台条约》签定后的第四天（九月十七日），清朝政府批准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并立即付诸实施。英国方面虽然很快就享受了条约规定的种种特权，但一直拖到一八八五年才予以批准，^④透露了《烟台条约》还远未满足英国侵略者的贪欲。

《烟台条约》的签订，使英国通过马加理案，在实现其扩大商务的战略目标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并得到窥伺我国西南边境的条约权利，从而打开了四川乃至西南的大门。因此，《烟台条约》被侵略者称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第三阶段，重要程度仅次于——一八四二年和一八五八年的条约。”^⑤

① 《东华续录》光绪十，第十三页；《中外条约汇编》第十五页；《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三四九页。

②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一五二页。

③ 《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一五四——一五五页。

④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二五五——二五九页。

⑤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第三三三页。